

安徽文史资料

第三十辑

安徽人民出版社

安徽文史资料

第 30 辑

424114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9年·合肥

封面题签：张恺帆

责任编辑：贾兴权

安徽文史资料

（第30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25 字数：20万

1989年8月第一版 1989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212-00191-0/K·20 定价：3.50元

目 录

景德镇3年·····	李清泉 (1)
祁休100天·····	朱 农 (18)
渡江战役回忆·····	孙宗溶 (25)
重建淮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	张祚荫 (39)
抗战后期的盱嘉支队·····	胡 坦 (48)
泾青南地区的群众工作·····	孙泰英 (64)
旧军旅生活的片断回忆·····	武之荪 (76)
廖磊、李品仙主持皖政概况·····	俞步骧 (86)
回忆一段监狱生活·····	詹云青 (99)
回国50年·····	王志远 (106)
军统在皖南的组织沿革·····	方曙东 (113)
民初的安徽教育·····	张跃宗、章凯华 (117)
浮山中学片断回忆·····	疏 荻 (127)
30年代的蚌埠乡村师范学校·····	时 生 (134)
30年代寿县中学的革命斗争·····	赵彦博 (140)
思乡忆往·····	唐功楷 (145)
松蓬传略·····	桂影超 (151)
回忆郑曰仁·····	胡芳远 (157)
怀念父亲吕惠生·····	吕道立 (164)
纪念陈尚和烈士·····	朱 农 (170)
革命老人吴鸿赐·····	吴敏慎 (177)

朱光潜传略·····	瞿光澄 (181)
汪采白传略·····	鲍义来 (185)
唐才常及其领导的自立军·····	孝 玮 (199)
聂士成传略·····	杨随英 (211)
龚镇洲传略·····	戴 健 (231)
曹少修烈士传略·····	马子勉 (242)
孙梅先二三事·····	孙宗溶 (251)
徐庭瑤生平·····	马俊如 (255)
张义纯简介·····	戴 健 (267)
杨虎其人·····	章长炳 (277)
一代侠妓赛金花·····	叶荫藩 (281)

景德镇3年

李 清 泉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进而侵占了我国的东北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许多志士仁人奔走呼号，为拯救危亡进行英勇而坚决的斗争，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篇章，演出了一幕幕宏丽壮阔的史诗。1935年至1937年，杜重远先生在景德镇举办江西陶业管理局附设江西陶业人员养成所。这个所的师生在校期间和部分学生毕业后留在景德镇所开展的各种进步活动，以及其中的一些人由爱国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思想历程，正是当时历史画卷的一个片断。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波澜壮阔的爱国运动浪潮中的一朵浪花，从一个很小的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我是养成所的一名学生，毕业后留在陶业管理局工作，在景德镇生活了3年。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就记忆所及，将这段历史作一回顾。

一

江西景德镇的陶瓷业历史悠久，素以“瓷都”闻名于世。但是到了近代，由于反动政府的腐败，封建行会的把持，管理方而弊窦丛生，加之工艺落后，景瓷产品不仅外销阻滞，国内市场也日渐为大量输入的外瓷所占据。许多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景德镇陶瓷业一落千丈，濒临绝境。30年代初，国民党江

西省政府想通过振兴瓷业来挽救本省经济不景气的局面，经宋子文、张公权推荐，1934年夏，他们邀请杜重远先生来赣主持瓷业改革。杜重远先生是吉林省怀德县人，1916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曾在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专攻窑业。学成归国后，他立志“实业救国”，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筚路蓝缕地创建了“肇新窑业公司”，开启了我国东北地区机器制瓷业的先河。杜重远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实业家、陶瓷专家，还是一位积极投身于革命民主运动的社会活动家。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前后，他受东北救国会和后援会的委托，兼做马占山将军的代表，在沪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从那时起，他和著名的七君子等爱国人士时相过从，常在《生活》周刊上发表抗日言论，与邹韬奋先生相互引为知己，并成为上海各界救国会的一员。后来他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周恩来同志直接指导下从事革命活动。1943年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邓颖超同志题词称赞他是“革命左派先驱，爱国据党英烈”。

杜先生亲至景德镇考察后，认为景德镇瓷业日益衰败，完全是“政府之放任所致”，振兴瓷业“非无办法，只在政府有无决心耳”。他向江西省当局提出了改革振兴瓷业的建议，得到批准，并受聘担任江西省陶业管理局局长。杜先生很清楚，要实现他的计划，靠国民党政府机构的大小官僚是办不成事的，必须培养一批掌握先进科学知识、具有爱国思想的专业人才来跟他一道干。因此，他在筹建陶管局的同时，也办了江西陶业人员养成所，宗旨是“将近代思想和陶业的初步技术灌输于诸同学，一年后共负此改良陶业的使命”。

养成所的招生广告刊登在杜先生主办的《新生》杂志和其他一些报刊上，写明招生对象是陶业学校和普通高中的毕业生；学习一年后，学生全部由江西陶业管理局分配工作；在校期间，学生无需交纳学杂费，衣、食、住包括零用钱均由校方供给。

当时绝大多数青年学生一出校门即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境，不少人看到养成所的招生广告，纷纷前来投考。当然，重要的是前来投考的人中有许多并非只是为了生计而来，而是因为仰慕杜重远先生的爱国思想和情操，希望在他的领导下做一番事业。

养成所招生考点分别设在上海和南昌。知名的陶业界前辈、原任我的母校江西省陶业学校校长的张浩(犀侯)先生在南昌主持考务。杜重远先生则亲自主持上海的招生工作。两地共录取80名学生，实际报到的学生73人，中途1人辍学，因此人们戏称养成所的学生是“七十二贤”。

养成所的招生、教学及有关各项工作的开展，实际上是陶业管理局业务的开端，而陶业管理局在1935年一年工作的重心，基本上也就是竭尽全力办好养成所。从局长杜重远先生、副局长张犀侯先生到一些主要职员，几乎都在养成所兼课，局务和教务差不多完全交叉在一起。教员大多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不甘做侵略者“顺民”，随杜重远辗转南下的东北流亡人士。他们是教员，也是陶业管理局的干部，他们都是杜先生的朋友，对杜先生都很敬佩，都是热心抗日救国的人士。但是在思想上他们有的比较守旧，有的却和进步学生心心相印，在思想上十分接近，如训育主任兼法制课教员的孙警中先生，俄文教员黄迺强先生等。在所有的教员中，最受学生欢迎和信赖的是孙警中先生。他平易近人，循循善诱，关心爱护每一个学生，深深理解、同情和支持学生的进步活动。西安事变后，有消息说国民党要逮捕原养成所进步学生的核心人物胡绵芳(胡明)、潘炯乐(潘田)，孙先生闻讯立即冒着风险，星夜赶至九江，通知在那里的胡、潘离开。1937年，我们决定“上山”参加红军游击队，当我们悄悄把想法告诉孙先生，他立即热情地鼓励道：“你们的选择是对的，我支持你们！”孙先生后来追随杜重远先生

去了新疆，惨遭反动军阀盛世才的毒手，埋骨天山之麓。他是永远值得我们深深怀念的。

养成所在课程设置上，着眼于振兴我国陶瓷工业的未来，不仅要培养工艺技术人员，还要培养管理、销售、开拓国外业务的人才。因此，除了开设陶瓷总论、陶瓷分论、筑窑、图画、瓷业生产调查、应用文等课目，还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制学、公司法等课目，并开设英、俄、日3门外语选修课。

1935年初，从南昌录取的学生首先报到入学，接着上海的学生也来了，养成所便正式开学了。养成所座落在景德镇风景秀丽的莲花塘的北面。陶业管理局最初也在这里办公，所以门口挂着陶业管理局和养成所两块牌子。养成所附设小型实习工厂等，房屋、设备均极简陋。尽管条件很差，由于杜先生开明的办学主张，所内实行民主管理，学生参加各种事务管理，师生之间关系融洽，学校生活朝气蓬勃。当时在我们中间，来自上海的同学大多视野比较开阔，知识面宽，思想进步。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文娱、体育方面都各具特长。通过开展文体活动，不仅活跃了校园生活，还团结了其他同学，在景德镇社会上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开始的时候，想开展文体活动，却没有一块开阔的场地。在杜先生倡导下，我们全体同学和部分青年教师，同心协力，一起动手，在养成所后面的一块山坡上清除乱石杂草，开拓场址。劳动中大家唱着开工前俞仁溥同学教的进步电影《大路》的插曲《开路先锋》和《大路歌》。

“轰！轰！轰！看岭塌山崩！天翻地动！炸倒了山峰，大路好开工。挺起了心胸，团结不要松！我们，我们是开路的先锋！我们，我们是开路的先锋！轰！轰！轰！哈哈……轰！”“大家一起流血汗！嗨嗨嗨！为了活命，哪管日晒筋骨酸！嗨嗨嗨！合力拉绳莫偷懒！嗨嗨嗨！团结一心，不怕铁碓重如山！嗨嗨嗨……压平路上的崎岖！碾平前面的艰难！我们好比上火线！”

没有退后只向前！”在欢愉的气氛中，我们用汗水建起了一个实用而简易的运动场。运动场上有篮球架、排球架、高低杠、沙坑等等。从这以后，养成所体育运动开展得非常活跃。以上海来的同学俞仁溥、顾正家、张呈枢等为骨干的养成所学生篮球队，在当时的景德镇是很有名的，他们与校外的球队比赛，从未输过球。通过球赛、开联欢会等活动，养成所同学和浮梁中学的学生以及景德镇社会上的青年，包括在外地读书的一些景籍青年，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团结他们共同为传播文化、宣传抗日救亡而努力。沉寂的莲花塘畔，骤然间显得生机勃勃，充满青春的朝气。

养成所虽然只办了短短的1年，但办得很成功，有两个显著特点：1.进步思想的熏陶。杜重远先生和养成所的绝大多数教员、学生都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全所洋溢着热心救国、追求真理和光明的浓厚气氛。当时国民党政府只拨了很少一点钱，办学经费还要靠杜先生四处奔走、多方张罗，一点一滴地筹集。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生活管理得井井有条，学校办得生气勃勃。当时杜重远先生曾对我们说，你们能否救国，要看你们能否救景德镇；你们能否救景德镇，要看你们能否吃苦；你们能否吃苦，要看你们能否严格训练和恪守纪律。在杜先生的影响下，大多数教员都能够埋头苦干，全体学生也都意气风发，一心一意要为抗日救亡作出贡献。杜先生在他的挚友邹韬奋被迫流亡海外后，1934年毅然挺身而出，把被国民党反动派查禁的《生活》周刊易名为《新生》继续出版。那时他既要办《新生》，又要参加其他各项抗日活动，难得久住景德镇。但是无论杜先生在或是不在，养成所内占主导地位的爱国进步活动始终开展得十分活跃，从来没有中断过。养成所之所以能在艰难的条件下办得生动活泼，在当时和后来都具有积极而进步的影响，不仅因为杜重远先生本人的进步思想影

响并为之倾注大量心血，还因为在当时以上海同学为骨干的一部分同学的进步思想影响下，团结聚集了一批以爱国主义为思想基础的进步师生共同努力奋斗。2. 紧密结合社会实践办学。在读书的同时，我们经常深入民众，开展一系列的进步活动，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让进步的时代气息，象强劲的春风，吹入景德镇这个被人们称为“草鞋码头”的闭塞市镇。在积极参加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关注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渴望找到自身的革命道路和救国救民的真理，加速了思想转变的进程。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结合社会实践办学，为实业救国培养专业人才的养成所实际上变成了一所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学校。许多学生在这里由一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列宁的信徒，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二

我们在养成所读书的那一年，中国历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央的正确领导。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年底在党的领导下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这年7月还发生了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新生事件，^①我们崇敬的杜重远先生因此而被捕判罪。尽管国民党在对革命力量进行疯狂的军事“围剿”的同时，不断加紧对进步文化的“围剿”，严厉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加强思想文化领域

^① 1935年5月，杜重远先生主编的《新生》杂志（周刊）发表易水（艾寒松）的《闲话皇帝》一文，议论中外君主制度，其中提到日本天皇。日本驻沪领事馆提出抗议，国民党政府亲日媚外，下令查封该刊，判处杜先生14个月徒刑。

全面控制，养成所绝大多数同学仍然执着地追求光明和进步，开展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活动，传播新文化新思想，鼓励民众抗日救国，在景德镇的历史上写下了值得回忆的一页。

养成所于1935年初举行开学典礼时，杜重远先生亲自主持并讲了话。此后，杜先生约有一个多月时间一直住在景德镇。那时他每天总要来和我们见面讲话，向我们讲时事，讲做人的道理，讲青年的修养，他要求我们做一个正直的、有真才实学的人。他常勉励我们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杜先生对我们的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启示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当时谈思想进步，就不能不谈抗日救亡，抗日救亡是当时思想进步的首要标志；谈抗日救亡，就不能不联系到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不满，也就不能不联想到在当时抗日最坚决的中国共产党和它所信奉的共产主义学说。这是当时养成所进步同学的思想发展规律，大家差不多都是通过学习和进步活动完成了这个过程的，上海来的同学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带头作用。

开学不久，养成所就建立了学生会，来自内蒙古的魏若虚担任了学生会主席。但在同学中起组织和核心作用的主要是胡绵芳和潘炯乐，其他骨干是俞仁溥、顾正家、李仁华、张星枢、任大钧、戴启祥等，他们同时还是体育运动的骨干和唱歌的好手。从我个人来说，和我比较接近的是一位名叫蔡希岳的同学。他在思想上对我帮助较大，常和我讲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启发我读了不少进步的和革命的书刊。当时养成所图书室有不少书，其中有一批是孙警中先生随杜重远先生在沪招生时，带着部分上海同学到福州路几家书店选购的社会科学书籍和翻译过来的苏联及其他外国优秀文学作品，随时可以借阅。此外，我们每个同学自己还订了不少进步的报刊，如《新生》和后来的《大众生活》，还有《读书生活》、《世界知识》、《妇女生活》、《译文》等。我开始读了一本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克鲁泡特金传》，引起了看传记文学的兴趣。接着就又读了《列宁传》、《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斯大林的传记）；同时读了大量的苏联翻译小说，最主要的是高尔基的作品，其他象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静静的顿河》以及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等也都在猎取之列。进而又开始读了许多通俗的关于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著作。在《读书生活》上连载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对我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很好的启蒙作用。那时除了开展宣传鼓动民众的工作，课余时间几乎全都用于阅读各种进步书刊。通过读书和同学之间思想交流，我们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我自己来说，开始只是对旧社会不满，对国民党腐败统治不满，并不知中国出路何在。经过养成所一年的陶冶，从政治上的幼稚状态转变到政治上开始觉悟，转变到走向革命道路，可以说这是我一生第一次思想上的转折。

我们在思想上不断有所前进，同我们深入民众，积极开展各种进步的社会活动是分不开的。这些活动多种多样，在我印象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有3件事情。

一是举办工人训练所。旨在通过提高瓷业工人的觉悟和文化水平，打破当时景德镇严重存在的行会之间隔阂，逐步造就一支适应改良陶瓷工业的基本队伍。担任教员的全是养成所的学生。工人训练所大致是按不同行业，地段远近开办的，一共有几处，各办了几期，现在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有的办得比较正规，训练期满还发给结业证书；有的则不那么正规。潘炯乐、胡绵芳等同学负责的那个训练所办得是比较成功的，他们在帮助工人学习文化的同时，还引导工人组织互助团体，通过开展文体活动，增进工人之间的团结友爱，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爱国思想。我当时所在的工人训练所，地点是在一个不太宽敞的工人家里。除了给工人辅导文化外，有时还宣讲一些时事或是让大

家在一起座谈。在频繁的接触中，我们耳闻目睹了许多工人受剥削和压迫的悲惨生活实况，帮助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论述的理解。不久前重返阔别多年的景德镇，我曾偶遇一位80多岁的老工人，他是当年工人训练所的学工，回忆往事，老人显得兴奋和激动，他为自己曾在工人训练所学习并领到结业证书感到骄傲。这也可以说明工人训练所在当时确曾起过积极作用。

二是露天讲演场。1935年下半年，陶业管理局成立了一个露天讲演场场务会议，其组成人员基本是养成所的进步同学，直接隶属于陶业管理局局长领导，下设总务部、宣传部、编辑部、民众接洽部，开展多项活动，宣传抗日救亡，增进工人和一般群众的知识。讲演场设在陶业管理局新局址的门前。那地方叫“厂前”，附近有不少茶馆、小摊，还有玩杂耍的、说书的，在当时可谓景德镇最热闹的处所。我们用木栅栏围了一块呈三角形的场地，搭起了一个土台子，在那里举行露天讲演。讲演者主要是养成所的学生和陶业管理局的职员以及邀请来的当地社会名流。那时在养成所讲公司法的李宝瑞先生曾把到讲演场参加活动的好处归结为：1.可以增长知识；2.可以得到心理上和精神上的训练；3.得到好的娱乐；4.是一种很好的运动；5.可以观摩亦即摹仿，行家可以表演，外行也可以学习。他还概括讲演场本身有5大优点：1.平民化。不限资格，不限年龄，不收票，任何人都可以来听；2.平等化。无论男女老幼，不分贫富贵贱，大家都坐在一起听；3.纪律化。男女分席，坐次有序，不许喧扰；4.简单朴素化。场内设备简朴，坐凳之外，仅墙上悬有格言，其余并没有什么装饰；5.集团化。大家如兄弟姊妹坐在一起，彼此联欢，既陶冶情感，又增进集团生活的兴趣。实际上，露天讲演场主要是反映了养成所进步同学和陶业管理局进步人士，在杜先生的影响下，借助向民众传播文化

知识的讲坛，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参加讲演场活动的基本群众是各个工人训练所的学工，也有不少其他各阶层的民众。从大家踊跃参加的情况看，说明当时广大民众是非常关心时局发展的。养成所同学在讲演中讲的主要是上海等地报刊上发表的爱国进步思想和观点，听众兴味很浓。到讲演场听讲是自由参加，但每场人都很满，秩序井然，这充分反映当时包括景德镇民众在内的全国民众，在民族危难之际，自觉地把个人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甘心亡国灭种的心态。露天讲演场渐渐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忌恨。后来国民党的专员公署以建标准钟为借口，迫使露天讲演场拆台，停止了讲演活动。

三是大众同乐会。开始是每周举行一次，后来改为两周一次，时间均在周末。所以也叫周末文艺晚会。晚会上的文娱节目非常丰富，有唱歌、武术、魔术、相声、小型话剧、京剧演唱等，有时还放电影。所有节目都是由养成所同学和各个工人训练所学工排练表演的。我曾在一出叫作《回声》的话剧中扮演了一个工人角色。当时晚会舞台上的抗日歌声和进步话剧，对唤起景德镇工人和群众的觉悟，激发他们的抗日救国热情，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和露天讲演场一样，很受景德镇群众的欢迎。除了这些活动外，当时还举办了图书阅览，办壁报，编刊物，接待群众来访等。根据露天讲演场一次场务会议的记录，可以看到大众同乐会和露天讲演会，只是露天讲演场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的一部分。当年那份场务会议记录这样写道：“本校（所）第二学期开始了，忙得紧，上午上课，下午实习，我们场中的工作太多了，恐怕会影响到功课方面，所以今天（9月3日）的场务会议中决议：（一）大众同乐会改两周举行一次。（二）图书阅览处改每日下午4时至6时开放。（三）壁报两天出一次。（四）大众园地改4天出一次。（五）民众半月刊改为月刊。（六）民众接洽处，每天一人值日。”从这份记录，约略可以窥

见当时开展的各项活动的大体情景。那时，我们许多同学以饱满的热情，不知疲劳地组织和参加这些活动。

在1935年这一年中，我们养成所的同学还进行了许多自发的进步活动。如胡绵芳等7个同学组织了一个前哨社，在景德镇《陶业日报》上开辟了《前哨》副刊，每周见报一次。前哨社成员在这个副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在校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如那时上海的一些报刊开展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前哨》及时转述了讨论情况，引起了养成所部分同学的兴趣。经过一番探讨，最后大家一致得出结论：中国的现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路在于反帝反封建。这对许多同学的思想进步是起到促进作用的。前哨社还为推广拉丁化文字花了不少精力。在社会上也产生过一些影响。

5月间，新生事件发生，杜先生被捕入狱。消息传到景德镇，养成所同学无不义愤填膺，当天就汇集在一起，写慰问信，推选代表赴沪向杜先生表示慰问。杜先生无辜下狱，这对他推行实业救国的计划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也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对敌妥协、顽固镇压爱国进步力量的丑恶嘴脸，更加坚定了我们抗日救国的信念。这时，邹韬奋先生从国外回来，11月16日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对正在酝酿和以后在12月9日爆发出来的学生运动作了充分的报道。我们通过《大众生活》及时了解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走向新高潮的大量信息，积极采取相应行动。北平学生遭到反动军警镇压的消息传来，我们走上街头游行，张贴抗日标语，高唱救亡歌曲，表示声援，使景德镇的救亡运动，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整体的有机的一环。养成所同学们的进步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不久国民党江西省第五区专员公署从鄱阳迁来景德镇，专员鄧景福先是把杜重远先生推荐的浮梁县长阎模阎挤走，使陶业管理局失去地方上

的协助和支持，接着又借口陶业管理局的大门刷了红色油漆，说这是“挂红招牌”，断言养成所的学生中“一定有共产党”。那时在陶业管理局实际主持一切的是秘书孙秀林，他在鄢景福的压力下，对进步学生和进步活动多方掣肘。胡绵芳、潘炯乐二位同学被专员公署限令3日内离开景德镇，未及毕业就被迫离去。到我们毕业时，江西省当局又以种种借口紧缩编制，使本来要全部留在陶业管理局工作的养成所学生，绝大部分得不到安排，只留下少数人在局里分配了工作。至此，杜重远先生的实业救国计划，已根本无法继续推行下去。但是，我们这些原来要被培养来为实业救国而奋斗的青年学生，从杜先生理想的幻灭中，渐渐看清了脚下的道路，许多人以坚定的步伐迈向革命的征程。

三

如果说1935年是我们轰轰烈烈开展各种活动，在实践中得到锻炼，思想上取得较快进步的一个重要阶段，那么，毕业后留在陶业管理局工作的部分养成所同学开展的活动就是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继承了养成所时期追求真理和光明的精神，尽管人数大为减少，开展活动也没有以往那样的规模和声势，但是却同抗日斗争实际结合得更为紧密。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加紧侵略我国，蒋介石仍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景德镇地方上的反动当权者更进一步压迫爱国进步力量。因此，我们留在陶业管理局的这些人，只得根据自己所面临的环境，采取相应的方式开展活动。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会在上海成立，不久，我们也秘密成立了江西救国会。这个名称是挺大的，但实际成员也就是我们留在陶业管理局工作的十几个原养成所的同学。